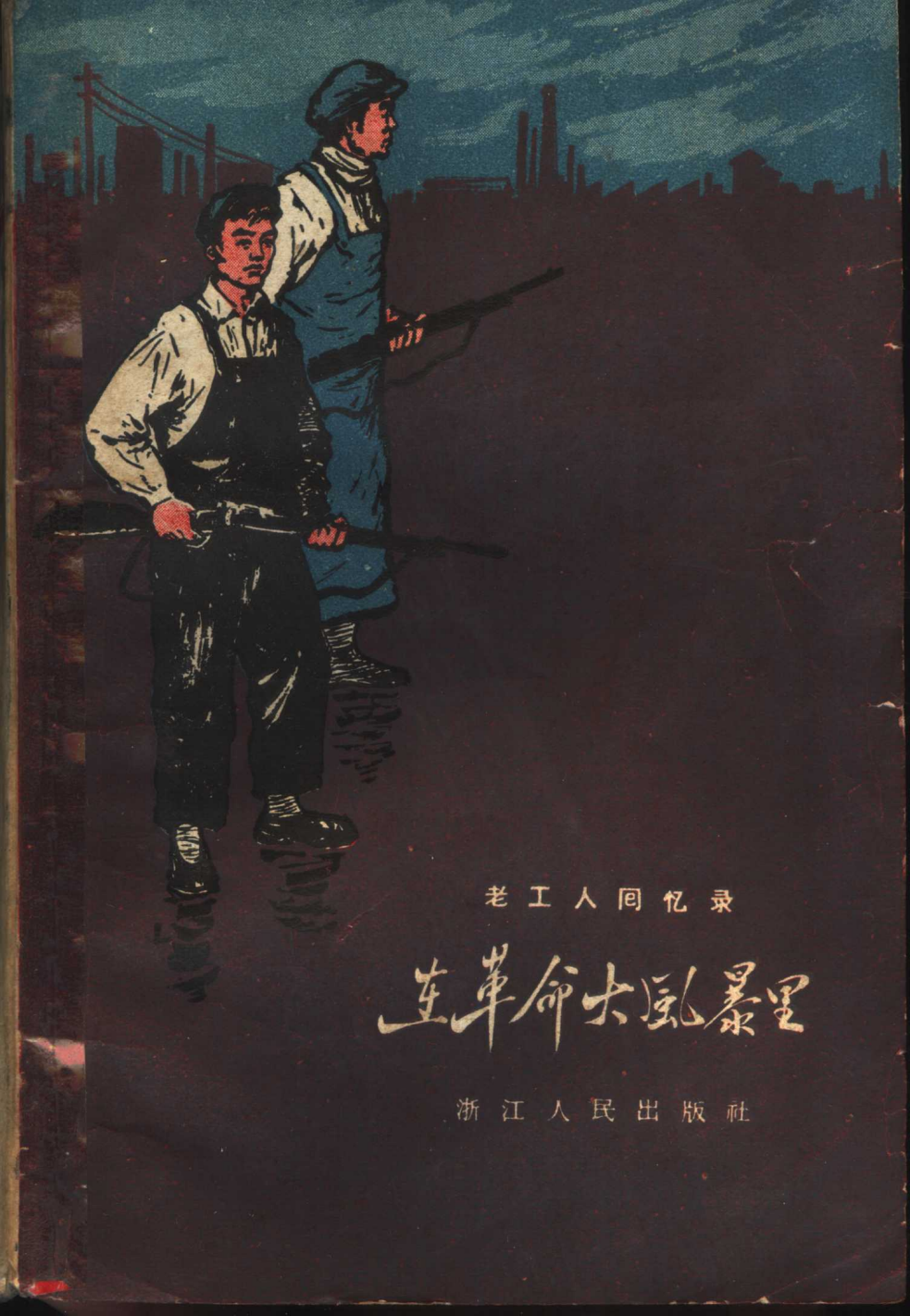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工人回忆录

在革命大风暴里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老工人回忆录

在革命大风暴里

浙江工人报編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收集了十位老工人的回忆录。其中有楊福林、朱英如、施小妹、張錫堂等过去亲身参加上海早期罢工斗争、武装起义和香港海員大罢工的革命斗争故事；还有本省老工人余阿青、寿阿五等控訴旧社会的黑暗、反映新社会中工人当家作主、过着幸福生活的事实。这些都是对职工，特别是新工人，进行革命傳統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生生的教材。

老工人回忆录 在 革 命 大 风 暴 里

浙江工人报編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 5/8 字数38,000

1959年11月 第 一 版

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統一書号：T40103·242

定 价：(5)一角三分

前 言

中国工人阶级自踏上政治舞台那天起，就在自己的先锋队—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。经过长期艰苦奋斗，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，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、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并且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在这个漫长的斗争岁月里，无数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站在斗争的最前列，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冲锋陷阵，许多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，他们的光荣业绩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！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收集、整理了上海和本省的十位优秀老工人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文章。这些回忆文章的内容，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，生动地叙述了他们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，如何从革命斗争中和艰苦的条件下生活过来的。他们那种永远听党的话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的崇高品质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；艰苦奋斗，自觉劳动，勤劳节俭，爱厂如家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；永远谦逊，虚心好学，刻苦钻研的不断革命精神，是我们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的榜样。

我们殷切期望，这本书的出版，能够帮助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工人，懂得我们老一輩工人所受的苦难，了解工人阶级光荣的斗争传统，从中汲取精神养料，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，遵循党所指引的方向，在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更大的功勋；

浙江工人报编辑部

1959年8月

目 录

赤胆忠心打天下.....	楊福林 1
前仆后继 勇往直前.....	朱英如 8
为真理冲锋陷陣.....	施小妹 13
海員工人的怒吼.....	張錫堂 19
人心齐 泰山移.....	章子偉 23
艰难的斗争道路.....	阮庆安 27
紗厂生活四十年.....	余阿青 30
叫我怎么不爱厂.....	寿阿五 36
扑不灭的怒火.....	張阿良 41
黎明前的战斗.....	吳 杰 45

赤胆忠心打天下

浙江省老工人报告团团员 楊福林
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

我从十一岁那年起，就进南京絲厂当学徒。过去当学徒，真是苦极了，名义上是学徒，其实呢，全是干些扫地、燒飯、洗尿布之类的活兒。做了三年，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罪，心里想，到哪里也比当学徒强，就悄悄地逃走了。离开了那个工厂，就逃到江西黃兴部下去当兵。那年，我还是个不足十四岁的人，人还没枪高，干了一个半月，長官就教我騎馬，学会后，再教我打枪，学了兩年八个月，已經会一面騎着馬跑，一面打枪，十枪中七枪。那时我的年紀还小，什么事情也不大懂得，就这样混了几年。

1914年，黃兴部队被軍閥馮国璋打垮了，我就到上海日本紗厂第三厂（就是現在的国棉十一厂）做工。那时做工也非常苦，我們工人沒命地干活，挣来的錢还吃不飽飯，这种苦日子真沒有办法过！

1924年，厂里有了党的活动，工人們开始組織起来。工人有了党的領導，就有了力量。那年10月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我們开始了要求日本資本家給工人增加工資的斗争。对于我們提出的增加工資20%的要求，資本家不但不答应，还組織流氓来打工人。于是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們在5月份开始了罢工。工人們选我做代表。我說我不識字。大家說不識字不要紧，能講話就行。工人兄弟既然相信我，我就不推辞地当了代表。斗争一开

始，我就叫人去把馬达关掉。在我們同一个大門里，有五个厂，一个厂罢工了，另外四个厂也一起罢工了。我們还成立了糾察队，搞宣傳、募捐等活动。資本家一看全部工人罢工了，一时慌了手脚，隨即叫“商会”出面来調解。这时，我們提出了五个条件：不准打工人；准許成立工会；罢工期間工資照发；不准开除工人代表；工資增加20%。狡猾的資本家为了爭取复工，一口答应我們的要求。但是复工之后，資本家除了不敢和以前那么瘋狂地打罵工人以外，其他都不肯照办，还对工人代表进行报复。

日本資本家这样坏，工人哪肯罢休！我和几个工人代表一商量，第二天，厂里又罢工了。日本資本家怕鬧大，就用金錢来收买我，說給我十万块钱，可以盖洋房、坐汽車。我对他說：“我是工人，你今天想拿錢来打倒我，办不到！”資本家一見收买不了我，就又想了一条毒計：收买工贼来杀死我。因为我早有防备，虽然我被砍了五刀，头上还挨了一铁棍，可是我也單枪匹馬地砍伤了他們六个人。后来，工人同志把我抬到医院去。因为这件事，資本家不要我在厂里做工了。

不久，党給了我四支枪，叫我做保卫工作。当时我非常高兴，心想：十年前学会的枪法，这次又派上了用場。我去找了三个工人，每天在家教他們打枪。过了不久，这三个同志的枪法，已經学得很好了。我們的胆子就更大了。当时，党給我們的任务是保卫工人开会。有一次，周恩来同志召开會議，也是由我們担任保卫工作的。那一次，我們早就安排好，外面、里面都有人負責保卫工作，如果敌人来了，外面的同志先对付，里面的同志再出来帮助，这样，就可以掩护負責同志安全撤退。

为了配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，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，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裝起义，我参加了其中的兩次，第二次武裝起义时，因为我身上的枪伤沒有好，所以沒有参加。

第一次起义的时候，我們小组是十个人，只有三支枪，其余的是各拿一把斧头，地点在潭子灣。說好了以炮声为信号，一齐出动，可是左等右等炮都不响。一直等到下半夜二点鐘，有人等得不耐煩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出去，結果吃了亏，到天亮就失敗了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仍旧到工厂联系工人，进行活动。日本人知道我在工人中活动，想乘机打死我。他們找了一个有十支枪的大流氓，但这个流氓还没有来得及下手，在一个清早，我和六个同伴就把这个大流氓堵在被窝里打死了。可是，由于我的疏忽，我也被躲在背后的敌人打了五枪，受了重伤。

我受了重伤后，党叫了医生到我家医治，当时为了避免走漏风声，医生走了，我也馬上搬了家；第二天还是这样，医生走后我也就走。看来我的枪伤至少要两个礼拜才可以好，这样搬来搬去很麻煩。第三天，我叫了一輛黃包車到宝山路紅十字医院去看。医生問我：枪伤怎么打的？我說：馬路上走路时被打的。医生又問：你不是打汉奸打的嗎？我說：不是。医生笑笑不响。我怕医生动我坏腦筋，从这以后，我就提高了警惕。第二天去时，我帶了一颗手榴彈、一支盒子炮，在看病时，我故意把衣服拉开来給医生看，心想，只要你犯我，我也不饒你；这样，我接連看了十多天。

我的枪伤才好了四五天，就参加了第三次武裝起义。那时，我們一起三十来人只有十五支枪，由我先偷运到虹鎮。我一人身上帶五支，手里拿一支，讓別的帶枪的同志走在前边，碰到抄靶子的就准备打，結果一点岔子也沒出，平安地到了目的地。我放下了这六支枪，再同租界取九支枪和子彈。我把枪放在馬桶里，誰知这一次給“包打听”发现，他看見我这只馬桶很重，要过来盤查。我一看苗头不对，就开了枪，边开边跑，沒有讓他們追上。

人多枪不够，我們就决定打警察局。到第一个警察局，要警察拿出枪，警察就乖乖地繳出了九支枪，連子彈箱也都拿了出來。

到第二个警察局，又繳了七支枪。我們的枪差不多了，正想走，不料他們在背后开枪了。我們就擲手榴彈打他們，这一下又夺来了二十支枪。这一天，我們一口气打了四个警察局，总共繳来六十多支枪。



一直打到宝山路桥，听说吳淞下来一团人，我們就挖了一段铁路，分三处埋伏和敌人开了火。我們这边肚子打餓了，工人就給我們送飯送茶水。敌人那边什么都沒有，又渴又飢。从下午二时打起，一直打到第二天九点鐘，他們吹号繳枪了。有些工人同志不懂，我告訴大家：敌人繳枪了，不要打了。我們把紅旗搖一搖，他們一个个举手投降。

接着，我們把敌人的武器彈藥从火車上搬下来，充实了工人的武裝。在这次起义中，我們上海有八十万工人参加了斗争，打垮了軍閥，胜利地迎接了北伐軍。

“四·一二”蔣介石叛变革命，上海陷入白色恐怖。第二年（1928年）我因叛徒出卖被捕了。

我一落在敌人手里，就沒有想活着出去。在牢監里，我看到了叛徒，恨不得咬他一口。可是，怕他再出卖其他同志，只好忍住怒火，我对叛徒說：“你只承認是我的朋友好了，不要承認和我一道工作，这样他們就会放你出去，沒有你的事。你要是承認和我一道工作，你就要倒霉；我吃官司，你也要吃官司；我枪

斃，你也少不了槍斃！你自己看着辦好了。”

叛徒听了我的话，在审问的时候，照我的话說。我也說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不是做工作的。”

“包打听”信以为真，果真把那个叛徒放了。他們追口供，我理直气壯地說：“我是工人，我承認什么？我承認你是汉奸，你是卖国賊！”

那个“包打听”气得七窍冒烟，随着一拳打过来。当天晚上，他們給我用了电刑，昏厥了又用冷水噴醒，再上电刑，死去活来五个轉，可是我一醒过来，就破口大罵。

他們看看硬的不行，就用軟的。一个“包打听”把头剃光，裝成犯人到牢監里来，他問我：“你为什么吃官司？”我說：“不知道。”等几个鐘头，又来問我，我还說不知道。到了晚上，他再問我，我就罵他：“滾你娘的蛋！你吃你的官司，我吃我的官司，你管什么？”他什么也沒有得到，第二天一早灰溜溜地走了。

不久，在一次公堂上，有十三个人指認我杀过人，还有一个汉奸的妻子也來作証。

“是你打死她的丈夫嗎？”法官問我。

“不是。”我說。

法官問那个女人：

“是他打死你的丈夫嗎？是你亲眼看見么？”

那个女人說她沒有看見，是死人告訴她的，法官追問：

“怎么，死人还会說話么？”

她說：“說兩句就死了。”

法官說：“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？”

这时，我想：法官向来都是帮原告，帮帝国主义、汉奸講話，他为什么帮我講話，这个法官也許和組織有关系，也許党在他身上化了錢。果然，法官宣判我一个无罪。

無罪也不釋放，第二天他們又把我轉到中國偵緝隊。

一到中國偵緝隊，“包打听”又照樣來問我：

“你槍殺了多少人？”

我說：“我沒有殺人。”

他說：“你不承認，看看刑罰吧！”

我說：“好，帝國主義的刑罰嘗過了，中國的刑罰還沒有嘗過！”

隨着，幾種酷刑輪流着來：三上吊，火燒，老虎凳，從鼻孔里灌胡椒水。痛得我單衫能絞下汗水來，鼻子和嘴都噴着血水。可是，我嘴裏沒吐半個字。

敵人找不到罪証，又沒有口供，只好判我個“私藏軍火罪”，徒刑一年，關了六個月交保釋放。我正在高興自己將死里逃生的當兒，誰知那些“包打听”聽說要釋放我，都說放我不得，放了，他們就要死在我手裏，結果又被判了個無期徒刑。

在獄裏，我還要鬥爭。我鼓勵死犯打監牢，但是沒有逃成功。從這以後，他們把我關進了獨監，天天打我，打得我口中直冒鮮血。後來我生病了，他們才不再打我，把我送進了病監。

在監牢裏，睡的是水泥地，吃也吃不飽，在冬天的夜里，凍得睡不着覺。但是我堅信天總會亮的，太陽迟早還是要升起來的。就這樣，我在監牢裏度過了十五年零四個月日子。

1943年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過去沒幾天，我出獄了。這時，家也沒有了，特別是組織關係一時也接不上，這使我非常着急。我想：我是工人，就只有用勞動來养活自己；既然是黨員，就得接上組織關係。於是，我托一個朋友把我介紹到福興煙廠錫包部去做工，尋找黨的組織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工作，一個人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膀，問：“朋友，工作好嗎？”我說：“靠朋友幫忙，都好。”當時，我心里一動，好像覺出點什麼，可是又不便冒失地多問。快解放的時候，一個工人被資本家打壞了，我怎麼也被

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从三楼冲到二楼，找到上次和我說話的工人說：“朋友，难道咱們不算人嘛？我年紀虽大，也要給他报仇！”那个工人却未同意我这样做。我心里更明白了，他一定是个地下同志，你不叫我做，这是組織上不准这样做，我就一声也不响了。第二天，那个工人就把地下負責联系工作的同志帶到我家里来，我把前前后后的情形詳細作了汇报，就这样，我終于接上了組織关系，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。我顿时增加了巨大的力量！

过了一些时候，上海解放了。几十年的革命斗争，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志，我們終于盼来了自己的队伍。我們胜利了！

前仆后继 勇往直前

浙江省老工人报告团团员 朱英如
上海国棉十七厂退休工人

我今年六十一岁了。在旧社会里，因为生活所迫，在十三岁的时候，就进了日本商人办的上海纱厂做工。那时候工人的生活真是牛马不如，资本家剥削、克扣工资，拼死拼活做上一天，按理应该拿到四角钱，但是，拿到手的顶多是二十几个铜板。那时候，工人劳动时间长，早上四点开工，晚上八点关车。我家离厂路远，三点钟就得起来跑去上班。讲起劳动条件，真是恶劣极了：黄梅天，水泥屋顶返潮，水直往地下滴，地面的水又向上蒸发，车间里的积水经常有一、二寸；真象活地狱！旧社会里的工人，资本家根本不当人来对待。工人放工出厂要抄身，女工连月经带也要解下来。和我一起有一个女工的孩子，因为没人照顾，被猫抓得浑身是血，险些肚肠也被抓出来，她为此请了三天假，回厂后就被开除了。那时光，女工生下孩子一星期就得上工。外国巡捕、流氓、狗腿子十恶不赦，看见漂亮点的女工要侮辱。想想看，一年到头过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，怎能叫人活得下去！

1925年5月15日，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、工人顾正红等，血染南京路，工人们掀起了巨大的反帝怒潮。顾正红同志是沪西内外棉七厂的工人。他所在的那个厂的日本资本家残暴得简直如同野兽，工人吃的饭不准由家里的人送去，都得由工人自己带去，一到夏天，饭老是餓得象浆糊。工人活不下去，就起来罢工，提出增加工资、不打骂工人等条件。顾正红同志是工人代

表，为了工人吃饱肚皮，去同日本人交涉时被打了四枪。他为了工人阶级利益而奋不顾身，壮烈牺牲了。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这种残暴行为，上海工人罢工，学生罢课，商店罢市，一部分巡捕罢岗，提出“收回租界，收回海关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”。这就是有名的“五卅”运动。当顾正红同志被日本资本家杀害，和各处罢工活动传到我们厂里后，当天晚上，我们就起来响应，开始罢工。第二天，我随着工人队伍，唱着歌，到引翔港去参加工人群众大会。我记得，那天做报告的是李立三同志。他穿着长衫，站在台上，虽然没有扩音机，声音却很响亮。他说：“工人一定要参加工会，依靠团结的力量，才不至于被帝国主义资本家任意欺压！”他还讲苏联工人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政权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最后又高呼：“取消不平等条约！”“打倒帝国主义，收回租界！”

从这以后，我和革命开始接近。我参加了工人纠察队，和大家一起去包围日本资本家的住宅，要他们赔偿中国工人的损失；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。

当时有两个学生经常帮助我。这就是张琴秋（现任中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）和沈泽民两位同志。他们给我讲过不少革命的道理。我还到他们主持的工人夜校去学习。张琴秋同志送给我一本“工人之友”，因为我不识字，她就教我，给我讲列宁夫人的故事，说中国一定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争取民族独立，男女平等。

不久，我就由他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这以后，逢到厂礼拜天，我常和小姐妹们一起外出宣传，叫大家团结起来参加革命。

在“五卅”反帝斗争中，大批爱国工人被开除了。为了使被开除的工人复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积极参加复工斗争。一天，我去参加为争复工条件的会议，被日本资本家知道了。第二天，

“包打听”木祥金生（日本人）叫我去問話。他問：“昨天你到哪裡去了？”我說：“你不叫我，我也要來，昨天我去一廠（上海紗廠有一、二、三廠）參加會議，要叫你去講復工條件，若不答應給被開除的工人復工，我們二廠、三廠就要罷工，如再不答應，全上海日本資本家開辦的工廠都要罷工！”日本人開始威脅我們，說要開除我們為首的三個女工。這怎么能屈服呢？我把手一揮，其他工人都圍上來了。日本資本家一看，有些慌了，連忙改口說：“讓他們（指被開除的工人）先休息幾天吧！”這次斗爭我們取得了勝利。

1925年冬天，廠里經理叫我去，說要提拔我當“招工”，工資每月四十元，招一個女工還可拿二元，一個男工五元。我聽到這些真是氣極了，心想：你們對工人威脅不行，就來利誘；就來收買；我對他說：“我沒有資格，也做不到。”那個經理又接着說：“我們可以認做兄妹，你要讀書可以送你到日本，只要一個條件：退出工會。”我想：工會是工人自己的組織，怎能退出工會？我恨極了，堅決拒絕了他。他沒有辦法，又勸我退職，說發給我五百元退職費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想到向黨的宣誓：誓死不效亡國奴！因此，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：“我們是靠做工吃飯的，‘橫財不富命窮人’，我不要你們的臭錢！”資本家利誘不成，反而被我奚落了一番。

1926年5月，黨派我到廣州去參加了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。廣州的工會、農會、學生會、婦女聯合會工作很活躍，這使我大大開了眼界，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。回上海後，黨派我到閘北搞工會工作，領導我的是當時上海大學學生、現在擔任全總主席團委員的楊之華同志。有一次，她叫我把絲廠工人組織起來，準備開一次大會，由她來演講，鼓勵大家參加絲廠工會。我把絲廠工人召集了，地點在閘北青雲路廣場上。不料，群眾集合後，帝國主義和軍閥派了不少走狗來捉上海大學學生，楊之華同志被阻擋

住，就沒能來參加。在沒辦法的時候，我只好自己上台去講。過去，我一向只在車間里和姐妹們隨便聊天，從來沒在幾千人面前講過話。這時，我也顧不得這些，鼓起勇氣說了一大堆工人一定要團結



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的話。特務看見台上有人講話，就把我當作學生，要來捉我。群眾說：“她是工人，不是學生！”把我掩護走了。我回去見楊之華同志，她高興地鼓勵我說：“阿毛，你現在真行！”

不久，黨派我擔任了絲廠工會主席，並且積極準備和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。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，工人同志表現英勇、頑強，堅貞不屈，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1927年3月21日，我們閘北工人包圍了敵人司令部，當時雖然由於工人們作戰沒經驗，槍又少，犧牲的人很多，但是敵人終於投降了。我們真開心，立即公開組織工會，喊出了“工人階級萬歲”的口號。這時，資本家沒法，只得讓被開除的工人復工。這樣的好日子過不到十天，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勾結，收買上海流氓頭子，組織流氓武裝，向工人進攻，開始了慘無人道的“四·一二”大屠殺。4月12日，我參加了遊行示威，遊行隊伍還未到蔣介石的司令部，匪徒們就對準工人隊伍用機關槍掃射。當時，犧牲的工人真是不計其數。但是這吓不倒我們。為了工人吃飽肚皮，為了民族解放，大家都很有頑強，時刻準備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。不

久，我被捕入獄。我記住党的教育，只流血，不流泪，为了革命死也光荣。因此，我入獄后，虽受尽折磨，又是怀了孕的人，但仍旧很乐观。1928年，我在監獄里生了一个孩子，等我出獄，孩子已經四岁了。在痛苦的黑暗年代里，我繼續煎熬了十五年。直到1946年，才与党接上关系，重新入了党。1949年解放，党把我从中央玻璃厂調到国棉十七厂工作，1955年退休。

今天，我們胜利了：“吃飯不忘种 田 人，喝水不忘 掘 井 人。”今天的胜利，是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長期的、残酷的、曲折的、艰苦的革命斗争而获得的。我們应当珍惜革命胜利果实，繼承和发揚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傳統，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，加速社会主义建設，并为在我国实现人类的壯麗事业——共产主义而奋斗。